



中国的贸易开放、 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研究

唐东波◎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的贸易开放、 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研究

唐东波◎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贸易开放、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研究/唐东波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9-10311-3

I. 中… II. 唐… III. ①对外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研究-中国
②对外贸易-影响-就业结构-研究-中国 IV. ①F752②F121.3③F2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7297 号

中国的贸易开放、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研究

唐东波 著

责任编辑/鲍雯妍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5 字数 150 千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311-3/F · 2006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对外贸易扩张与垂直专业化产品内分工已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中国的出口中到底包含多大比例的国内附加值,贸易开放对于国内的产业升级含义如何,以及对就业结构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在近年来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

出口中的国外成分和国内成分的比例通常可以用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通过计算 VSS 值确定,由于中国官方没有编制针对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表,准确估算出口的附加值变得十分困难。本书在 HIY 方法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加工贸易对于一国出口品价值构成的特殊含义,并通过贸易模式来识别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从而为准确估算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提供了一个简便的替代方法。

首先,2008 年 115 个三位数工业行业的估算结果表明,按各行业出口值为权重计算的加工贸易整体的附加值率约为 44%,而一般贸易的国内附加值率则高达 90% 以上。出口扩张最快的技术复杂行业,其国内附加值率均小于 50%。因此,中国出口技术复杂产品的现象可由加工贸易的扩张来解释。这意味着,即便中国出口越来越复杂的产品,还只是中国加深参与全球垂直分工的结果。

其次,进一步考虑到通过一般贸易进口的中间品在国内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之后,2006—2008 年二位数工业行业的估算结果表明,2006—2008 年中国出口的 VSS 均值达 47.1%,约为 HIY 方法的两倍,可见国外成分整体较高主要源于加工贸易。进一步细分行业的结果显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值中的国外成分显著地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科技含量集中的电子设备制品行业的 VSS 更是高达 84%,说明中国出口巨额增长只是某种“假象”,出口品所含

技能水平的提升并未反映为国内附加值的同步增长,产业升级步伐缓慢。另外,贸易对象的收入水平与出口产品的 VSS 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

关于全球化因素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总量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1)进出口贸易的扩张并未提高中国的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该结论与 H-O 模型一致;FDI 与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显著正相关,这也验证了 Feenstra-Hanson 外包理论中有关资本流入如何影响就业结构的基本判断。(2)进口贸易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而出口贸易对就业结构的不利影响则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行业。(3)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外资企业及沿海地区的 FDI 强化了出口贸易对国内就业结构的负面效应。

为进一步考察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影响,本书还利用 2004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库(CASIF)和海关贸易数据库(CCTS)对这一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1)来自 OECD 等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比重(VSS_H)上升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从亚非拉等低收入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份额(VSS_L)增加将带来劳动力技能水平的相对下降。(2)企业出口比例的提升,尤其是一般出口显著强化了 VSS_H 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的正相关性,而加工出口占比的提高则不利于这种相关性的加强。(3)资本深化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澳台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相当缓慢。我们借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对此进行合理解释,并展望了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道路选择。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内要素禀赋,对于中国而言,就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综合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讨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成功实现国内就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含义。

唐东波

2013 年 11 月 23 日于复旦园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方法与数据	5
1.3 本书的结构与内容	8
1.4 本书的创新之处	11
第 2 章 文献评述	14
2.1 中国出口的附加值估算	14
2.2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产业升级	20
2.3 全球化与中国的高技能就业需求	23
2.4 垂直专业化贸易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26
第 3 章 中国出口的附加值估算	34
3.1 引言	34
3.2 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估算：方法、数据与结果	38
3.3 结论性评注	46
3.4 附录	47
第 4 章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产业升级	53
4.1 引言	53
4.2 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特征与比较优势	54
4.3 产业升级：概念、测度及分析	60
4.4 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为什么这样缓慢	76

4.5	小结及展望	81
4.6	附录	85
第5章	全球化与中国的高技能就业需求	87
5.1	引言	87
5.2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及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89
5.3	模型与数据	93
5.4	计量分析	99
5.5	小结及政策含义	107
5.6	附录	108
第6章	垂直专业化贸易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110
6.1	引言	110
6.2	垂直专业化份额的测算方法	113
6.3	模型与数据	116
6.4	计量分析	128
6.5	小结及政策含义	145
第7章	全书总结及政策含义	148
7.1	总结	148
7.2	政策含义	152
参考文献		154
致谢		167

图 表 目 录

图 3.1	进出口商品数据向行业数据的匹配过程	40
图 3.2	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率(部分三位数工业行业)	44
图 4.1	中国出口规模及进出口占世界比例	55
图 4.2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特征及外资对于顺差的重要作用	55
图 4.3	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各自所占总顺差比例	56
图 4.4	部分行业贸易顺差的变化特征	57
图 4.5	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及加工顺差在总顺差中的主导 地位	58
图 4.6	中国进出口贸易显性比较优势(RCA)的动态特征	59
图 4.7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	65
图 5.1	中国的出口及其占 GDP 比例(1979—2010)	89
图 5.2	中国的 FDI 规模(1983—2010)	90
图 5.3	中国的外资企业出口占比(1992—2010)	92
图 5.4	全球化价值链中的外包活动	93
图 6.1	中国的贸易扩张模式	111
图 6.2	加工贸易作为中国贸易顺差的来源(1992—2009)	112
图 6.3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	114
图 6.4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工人相对需求的影响	119
图 6.5	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内高技能工人相对供给的影响	122

表 3.1	BEC 对中间品的定义	39
表 4.1	总出口中的国外成分与国内成分	70
表 4.2	国外成分与国内成分:一般出口与加工出口	71
表 4.3	细分行业出口中的国外成分(2007)	72
表 4.4	细分各贸易伙伴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75
表 4.5	东亚四小龙的产业政策与效果	77
表 4.6	入世后中国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的调整	78
表 5.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97
表 5.2	基本回归分析结果	100
表 5.3	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比较分析结果	103
表 5.4	内资与外资的比较分析结果	104
表 5.5	沿海与内地的估计结果	106
表 6.1	BEC 对中间品的定义	114
表 6.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27
表 6.3	基本回归结果	129
表 6.4	企业部分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34
表 6.5	细分资本类型、贸易模式、资本密度与地区特征的回归 结果: VSS_H	134
表 6.6	细分资本类型、贸易模式、资本密度与地区特征的回归 结果: VSS_L	136
表 6.7	稳健性检验结果	142

第1章 导 论

1.1 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开放给予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产业分工链条的机会,从而可能使其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同时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实现国内产业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如何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从而加快深化本国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附加值的挑战。因此,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就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各国的产业发展经验来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发展不仅得益于全球化贸易,而且还因为其产业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①。对此,Summers 却认为,选取成功的产业政策就像是选择股票,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在那段时间里就好像非常成功的投资专家,正好选对了股票,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股民都能够像这些投资高手那样成功,所以不要妄图去学习他们,而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②。

就中国而言,鉴于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历史条件 and 政治考虑,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对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中小型企业完全采取了鼓励进入的优惠政策,加上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大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伦敦经济学院 Robert Wade 所著的 *Governing the Market* (1992)。

② 参见 Rodrik, Dani, 2008, “Normalizing Industrial Policy,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3。

调整(譬如给予中国内地最惠国待遇),其结果是,加工贸易很快主导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事实上,中国在之后的对外开放中执行的也是中性政策,放弃了国内产业政策和产业升级战略。中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升级策略之间从此不再有衔接,这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早期的做法非常不同,WTO 谈判和 2001 年入世均能看出中国对产业升级政策的放弃。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形成一个判断,尽管最近产业升级的话题频频见诸媒体与学界,不绝于耳,但 30 年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可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和策略,仅有开放的自由贸易和 FDI 政策(张军,2010)^①。

对于贸易扩张、产业升级以及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学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基于 H—O 理论主张比较优势的禀赋论一派认为产业升级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演进”的结果,这种自然演进是由自由贸易引起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推动的。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对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林毅夫等,1999)。而在贸易理论的发展上,自从 Krugman(1979, 1980)等人开创新贸易理论以来,尽管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重视,但在这些理论中,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都不是形成比较优势所必需的,无论是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还是集聚规模与程度的决定,产业升级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几乎是可有可无的。Melitz(2003)在新贸易理论中引入企业异质性后,更是把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升级归结为异质性企业在贸易压力下的自选择效应。可以说,贸易理论主流的发展几乎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的扩张与产业升级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自由贸易的理论学说是完全建立在完美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之上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特殊发展阶段往往为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而特定的产业升级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使得经济从低均衡状态跃升至高均衡状态(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 2010),与上述主张禀赋论和自由贸易的学者有所区别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产业升级政策时显

① 张军:“产业升级为何这么难?”,《新民周刊》,2010 年 9 月 13 日。

然要谨慎得多,他们往往主张具有引导性的、培育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往往是这一派学者最有力的武器(例如:Amsden and Chu,2003;瞿宛文,2002,2003)。

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来事实上缺乏切实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或策略,主要依赖于自由贸易和 FDI 的政策,这一方面与东亚日、韩和中国台湾的经验不同,另一方面却又隐隐与上述自由贸易理论和禀赋论的主张相合。相应地,文献中关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对相关政策多采取批评态度(如 Thun, 2004)。但瞿宛文(2009)以汽车产业为例,对中国的相关产业政策及其演变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并不如学者印象中那般毫无作用。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明显的产品升级过程,近年来对中国出口产品构成的研究明确地支持这一点。例如 Rodrik(2006)观察到,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构成相似的国家,其人均 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Sophistication)也在持续上升。Amiti 和 Freund(2010)通过比较 1992 年和 2005 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发现,农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则有大幅的上升。Wang 和 Wei(2010)通过将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 G3 国家出口而中国没有出口的产品种类从 1996 年的 101 种下降到 2005 年的 83 种,分别占有产品种数的 2.44% 和 1.97%。Yang 等(2009)也发现,1980 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经历了明显的升级过程,但这并不足以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伴随着贸易开放同步发生这一结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加工贸易占据了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中相当大的比例,在出口产品技术构成水平上升的同时,加工贸易部门进口中间品的技能含量与价值也在明显上升。例如,Amiti 和 Freund(2010)就发现,中国出口行业技能密度的提高主要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因此,很多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中国出口产值的国内与国外份额比例上。

显然,一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以及产业升级的进程均应该根据该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相对位置和贡献额的变化来加以度量,而不应该仅仅观察出口产品的结构和复杂性。可是,在贸易统计上,与出口总值相比,出口的附加值并不易获得,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在全球开发出一个可以反映全球生产链分配的跨国的投入产出表,而且在现有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上,要在一国的出口总值中剔除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并不容易。在缺乏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前提下,一些研究开始对单个国家或者单个产品的出口进行附加值的估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的估计成为最近几年的一个热点。本书将通过测算中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来研究“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价值分工链中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多年来的贸易扩张,尤其是加工贸易如何影响了国内的产业升级?

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贸易理论往往预示着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本国低技能工人相对需求的上升^①。譬如,根据 Heckscher - Ohlin(简称 H—O)模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丰富,其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环节,因此自由贸易将增加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基于 H—O 模型,Stolper-Samuelson 理论进一步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会提高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并且其与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也趋于缩小。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大多数国家在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其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例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上升,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下降。令人吃惊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变化的结果却与传统贸易理论背道而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相对于高技能工人而言,全球化贸易并未使低技能工人的境遇得到显著改善。

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作为典型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近几年也经历着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就业技能结构转换,甚至出现了“技工荒”的现象。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

^① 在本书中,高技能工人与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劳动力等概念将视行文方便交互使用。

布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表明,2000 年以来中国中高级技能劳动力一直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有迹象表明这种就业结构转换仍将持续下去。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个明显的悖论呢?是传统贸易理论过于程式化因而无法捕捉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还是有其他力量制约了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究竟是什么?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能够改善中国就业结构并支持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些问题在“入世”10 年之后的今天变得非常重要且尚无确定的答案。事实上,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正在升温。我们希望本研究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贡献。

1.2 方法与数据

1.2.1 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综合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首先,为准确刻画产业升级概念,我们改进了 Hummels *et al.* (2001) 所提出的计算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方法(HIY 方法),从而有效地度量了中国通过贸易开放在参与全球生产链中做出的相对贡献。其中,对于加工贸易而言,测算垂直专业化份额所需的进口中间品价值由贸易模型进行识别^①;在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识别则借助于联合国(UNSD, 2003)所制定的广义经济分类标准(Classification by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BEC)。

我们依托课题组所掌握的多个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出口产值中国内外份额比例,据此考察了产业升级与出口构成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统计学方法,并在计量分析过程中充分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用模型(FE, Fixed Effects)、随机效用模型(RE, Random Effects)以及截面数据的“OLS + 稳健标准差”回归方

^① 在本书中,垂直专业化水平、垂直专业化份额、垂直专业化率,以及垂直专业化程度等概念将视行文方便交互使用。

法,实证研究了全球化和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影响。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将基于“附加值”贸易的纵向全球化分工形式模型化,研究了国际劳动协作中不同技能水平工人之间的“交叉协作”模式,并考察这一作用机制对国内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所造成的可能影响。

1.2.2 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用数据涉及企业所属细分行业、企业注册类型、企业所在地区和企业本身等四个维度,涵盖了1980年代以来历次工业普查和全国经济普查的完整数据。

在三位数行业数据中,受进口中间品的HS编码形式所限,也受测算中国垂直专业化份额所需的其他数据可得性的制约,本书对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的估算最终只能以2008年为代表。虽然2009年是年度贸易数据最近的年份,但最近年份的三位数行业的数据集却是2008年,这是由经济普查给出的三位数行业的最新数据。

在生成每个行业的贸易数据时,我们是将HS编码的进出口数据按照HS与GB/T的对照表归并到三位数行业的。我们最终采用的GB/T行业代码范围是130—450,共涉及164个三位数行业。

最终,我们用于测算三位数行业垂直专业化份额所准备的基础数据包括按贸易方式细分的进出口值、进口中间品的价值以及各行业的产出值等。其中,细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HS编码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2009)。根据BEC与HS的对照表,我们可以识别并获得进口中间品的数据。各行业产出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10)。

在二位数行业数据中,我们的采样频率为年度,时间跨度为2006—2008年。考虑到垂直专业化份额测算中所含的产出值和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流量关系仅限于二位数行业,我们需将经转换所得的三位数行业贸易数据加总至二位数行业。并且,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加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部分行

业,最终考察的 GB/T 行业代码范围是 13—45。

测算二位数行业垂直专业化份额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按贸易方式细分的进出口值、进口中间品值以及产出值和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流量等。其中,细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 HS 编码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7—2009)。根据联合国(UNSD, 2003)所制定的广义经济分类标准(Classification by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BEC)与 HS 的关联表,我们可以获得进口中间品数据。产出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7—2009)。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流量关系 T_{ij} 须通过投入产出表才能获得,而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又仅限于逢 2 和逢 7 的年份发布,与本研究所考察的时点最近且可用的投入产出表发布于 2007 年,因此我们采取替代的办法,即将 2007 年的 T_{ij} 代替 2006 年和 2008 年的投入产出关系^①,其数据来自《中国投入产出表》(2007)。

企业注册类型和企业所在地区两个维度的数据来源于上述行业数据相同。其中,注册类型中的内资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国有联营、集体联营、国有与集体联营、其他联营、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独资、私营合伙、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内资等 15 类。外资企业包括与港澳台合资经营、与港澳台合作经营、港澳台商独资、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 8 类。所在地区的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其他省市自治区划为内陆地区,且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

在企业微观数据中,本书所用数据来源于 2004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库(CASIF, China Annual Surveys of Industrial Firms)跨越了 37 个二位数工业行业,覆盖了中国内地 31 个省市自治区,这些企业贡献了中国 95% 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出口值。并且,该数据库所涉及的

① 此处隐含的假设是技术(投入产出关系)在短期内(即发布投入产出表的前后 5 年)未发生明显变化,类似的做法可参见 Koopman *et al.* (2008)。

指标也较为完整,具体包括企业名称、企业地址、主营产品、行业代码、注册类型、企业规模、经营状况及有关财务报表等重要信息。此外,该企业数据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包含了本书所关注的企业员工信息,具体包括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同时还含有职工培训经费等数据。

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CCTS, China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详细记录了2000年以来所有进出中国海关的商品贸易。其中所含的主要信息包括企业名称、企业地址、注册类型、产品代码、进出口数据和金额、贸易方式、贸易国家等信息。更为重要的是,CCTS数据库中的所有产品代码均采用HS8位数编码形式。如此一来,按照之前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轻易地识别进出口的中间品价值。另外,由于原始数据均按月度统计,为了与CASIF数据库中的年度数据统一,我们将CCTS各指标进一步汇总成年度数据。

由于CASIF数据库和CCTS数据库存在大量相同的企业,两大数据库的匹配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到企业层面来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是如何发生的。通过从微观角度大范围考察中国企业出口背后的进口活动,进而考察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纵向分工贸易中所处的位置,也将极大地方便我们分析当前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国内就业结构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3 本书的结构与内容

本书一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书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所用的数据和方法,以及结构安排和创新之处;最后一章为全文总结及本研究的政策含义。

第二章是文献评述。这一部分首先对近几年有关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估算的研究文献做一介绍和评论,指出在投入产出表框架下研究中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份额时面临的技术难题,并讨论了利用海关贸易数据估算中国出口附加值的可行性。接着,我们对贸易开放、产业升级以及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了理论综述,并